

# 非传统战争抑或“非传统占争”?

——非传统安全理念 3.0 解析

余潇枫

**内容提要** 全球新冠疫情危机让人类不得不踩下全球化的“紧急刹车”。人们应认识微生物世界对人类带来不期而遇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从“后人类”与“新物质主义”视角看,微生物与人类的紧张关系是一种非传统安全的相互依存又相互抗争关系。面对疫情危机,人类需要升级自身理念以与之应对,即要探索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立场的超越,探索全球化之后人类发展的可能走向,探索从安全共同体理念到“安全聚合体”理念的提升,进而建立起生态化、电子化和美学化三者合一的新生存方式与社会构型,以达成真正的人与自然的和合共生与安全共享。

**关键词** 非传统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化 后人类主义

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再次给疯狂破坏地球生存环境的人类敲响了“警钟”。面对不期而至的特大疫情危机,有人用“战争”或“新世界大战”相比喻,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对其做出比喻,只要使用“战争”一词就会产生两个问题:首先,“战争话语”凸显的只能是传统安全的思维与语境,与微生物世

---

\* 余潇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邮编:310058)

界自然进化不甚相干；其次，“战争话语”无法准确揭示疫情危机的“非传统安全”本质。“微生物政治学”(Microbialpolitik)<sup>①</sup>在研究“传染性疾​​病与国际关系”时早已阐明，存在于地球达数亿年的微生物对人类造成的巨大挑战与威胁是“非武”(非军事武力)的，微生物呈现的只是自然演化规律与经过无数次迭代、优化后的“安全算法”(Security Algorithm)。<sup>②</sup> 如果不用“战争”一词，那么，用什么词来表达这次让人类恐慌的疫情危机更为确切？我认为用去掉“戈”的含“非武”之意的“占争”(occupation but no war)一词更为合理，展开来说，“占争”是通过“占”有生存资源以“争”得其生长繁衍的最大可能来指称人类与微生物世界，以及其他非人类间的“紧张”关系。如果说微生物挑战人类的非传统安全本质是“占争”而非“战争”，那么，人类就需要有与之应对的升级版理念，这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 一、全球治理进入了“人类世”？

“人类世”(Anthropocene)一词来自“anthropo”(希腊语意为“人类”)和“cene”(来自希腊语“kainos”，意为“新的”或“最近的”)，该概念的提出源自“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地质史观。当人类的工业化进入高速发展之时，为充分肯定工业化带来的巨变及对地球特征和环境带来的深刻影响，少数著名科学家开始用“人类世”来表示地球进入一个新的地质世，进而凸显人类的中心地位与主体性作用。<sup>③</sup> 随着这个概念被不断接受，“‘人类世’已不仅只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紧急性意味的基准性概念”“人类与自然之间‘现代’分离的真实性正在被打破，从而显现出一张彼此激烈的关系网”。<sup>④</sup> 有学者专门著书阐述“人类世”，强调人类是地球演化的主要驱动力，强调“人类世”促

① 费德勒认为，传染病造成的严重问题是：基于病原体能消灭核心人口基数而对一国经济与政治稳定性造成威胁，因而理解传染病控制的国际政治或“微生物缘政治”变得十分重要。David P. Fidler, “Microbialpolitik: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14, No.1, 1998, pp. 1-11.

② 微生物生存的安全算法有“体小面大”“吸多转快”“宜温代谢”“指数级繁殖”等。

③ 在20世纪，“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得出结论，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由人类主导生态系统的世界，鉴于人类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深远影响，甚至可以说地球已经从‘全新世’过渡到可以被称为人类世的一个新时代。”参见〔美〕奥兰·扬：《复合系统：人类世的全球治理》，杨剑、孙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2页。

④ 《在“人类世”中转变能源安全思想》，载余满枫主编：《非传统安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4—14页。

成了人类与自然耦合的“治理复合系统”的形成。<sup>①</sup>

其实,“人类中心论”的观念由来已久且最早起源于宗教。在古希伯来上帝造人的神话中,人类按上帝意愿统治世上万物,是上帝“授权”的自然界主人。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形成了“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宇宙的目的,人是宇宙的解释者”<sup>②</sup>的自我存在意义的独断式诠释。由于人类早期科学知识的缺乏,地球曾一直被视为宇宙“中心”,人不仅成了地球的“主人”,甚至“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sup>③</sup>近代启蒙运动之后,人类在摆脱宗教束缚而转向人自身解放的同时,形成了人作为施动者与自然作为受动者的“主(体)—客(体)”二分的理性主义认识论。从笛卡尔提出人要“借助实践使自己成为自然的统治者”到康德主张“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从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到洛克主张“对自然界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使得作为一种“人代为神管地球”的朴素观念,演变为“人能主宰一切”的“人类中心主义”。

即使到了现代,虽然生态平衡与生态保护已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意识,但人作为自然“主人”,自然作为人的“工具”,人仍然是自然的主导者、地球生物圈的管理者立场并未改变,保护自然环境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保护人类自身的利益。这种以“生态保护论”为核心思想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虽扬弃了传统的“人类征服自然”“人定胜天”局限,在协调、平衡地球生态系统中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但其自视为生态系统代言人的困境仍然存在:一是无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二是混淆“道德代理人”(Moral Agent)与“道德顾客”(Moral Patient)关系,三是拘泥于利己主义界限,四是没能摆脱现代主义的本质主义、还原论和绝对理性主义的泥潭。<sup>④</sup>

## 二、从“人类世”转向“生态世”

在人类漫长的演进过程中,“人类世”的提出有着其积极意义,至少体现了“人与地球不相分离”“地球深深地烙下了人类烙印”的状态,而且为了生存环

---

<sup>①</sup> Oran R. Young, *Governing Complex Systems: Social Capital for the Anthropocen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7.

<sup>②</sup>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Merriam Co., 1976, p. 93.

<sup>③</sup>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54 页。

<sup>④</sup> 余潇枫:《人格之境:类伦理学引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7—149 页。

境进一步强调“关爱地球原则”。<sup>①</sup>但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解读人类自己的“贡献”进而对“人类世”做出诠释,表达出的往往是人类的“自我中心”与“自我膨胀”,最终误导的恰恰是人类自己。“人类世”是人类中心意识的最高表达,既然“人类世”是最集中代表人类中心主义的范畴,那么要超越它,我们必须用“生态世”(Ecocene)范畴来取代。“生态世”中“Eco”的希腊语是“oikos”,意为“栖息地”或“房屋、住所”,英语意为“生态”;“cene”在英语中意为地质记元的“世”。因而“生态世”一词,正好与“人类世”相对应并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原有立场。只有从“生态世”,亦即包括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广义生态主义(Pan-Ecologism,)的角度解读人类的生存定位,才能走出“人定胜天”的误区。

与“生态世”相应的广义生态主义概念或理论早已存在,如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去日远的“动物中心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这些理论关注的生态内在价值各不相同,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即其生态伦理观都从“人类中心论”转向了“非人类中心论”。随着深空探测的增加,人类的“星球意识”不断觉醒,开始越来越把自己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广义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尽管过往人类的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质形态,形成了有了人类以后才有的矿物质、地质层,有了与微生物抗争的成就如消灭天花等,但这一切并不能推导出人类就是地球主人的结论。

人类如何超越自身而重新认识人类只是生物圈中的一员?英国开放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在其《绿色政治思想》中强调,人类活动必须限制在何种范围内才不至于干扰非人类世界,而不是只关心人类的介入在什么程度上不会威胁到人类自己的利益,并以此立场差异划分为生态主义和环境主义,以区别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sup>②</sup>按照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哲学教授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提出的以自然内在价值作为核心的自然价值观,如果说狭义的旧伦理学仅强调一个物种的福利,那么,广义的新伦理学必须关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生命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sup>③</sup>

“生态世”的提出首先意味着人类看待地球视角的再次转换,其次是人类和合共生的对象从人类扩展至非人类,再次是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研究被纳

① [美] 奥兰·扬:《复合系统:人类世的全球治理》,第151页。

② [英] 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郁庆治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余潇枫:《人格之境:类伦理学引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入“后人类”(Posthuman)<sup>①</sup>或“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sup>②</sup>范畴。新近出现的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又译为新唯物主义)为“生态世”的诠释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以往的唯物主义以有生命的意识与无生命的物质作为两对最基本的范畴展开其理论的阐述,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对自然的再认识,出现了超越旧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新景象:大量有生命的物质、无生命的智能体、基于基因技术的新生命体、基于量子物理层面的超意识现象,以及能和人类的意识、感性、知识等特征相互联结的、具有超级智慧大脑的“强人工智能”体(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sup>③</sup>等都参与了地球的演化与人类的发展,如何认识这些既非物质又非意识的“基于生命的新物质体”“基于物质的新生命体”“基于智能的非生命体”或“强人工智能行为体”等成为新物质主义的研究对象与主要内容,同时,也是人类再次反思自身存在定位的新起点。因此,一种全新的“新物质主义”视角的“生态世”理念——人类与非人类共生共享——应运而生。

“生态世”强调的是人类与自然包括微生物世界和合共生的广义生态观,凸显的是人类与非人类“优态共存”<sup>④</sup>(superior co-existence)为核心价值的“和合主义”范式,<sup>⑤</sup>甚至为了合理处理人与生态关系,人类在地球上的身份要从“世界公民”转向“生物公民”(Biological Citizen)及“生物公民权”(Biological Citizenship)<sup>⑥</sup>要优先于“社会公民权”。可以说,用“生态世”替代“人类世”,给人类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特别是为重新设计应对微生物世界的非传统安全“占争”的安全算法提供了新理念支撑。

### 三、从全球化转向“网”球化

对人类文明演进来说,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它在使国内工业化与国家能

---

① Erika Cudworth and Stephen Hobden, *Posthum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plexity, Ecologism and Global Politics*, London/New York: Zed Books Ltd, 2011.

② Cary Wolfe, *What Is Posthuma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③ 《从 AI 到 AGI, 未来最强的人工智能是什么?》, 2019. 12. 13, <https://www.jianshu.com/p/fb834ed79441>, 2020-05-24.

④ 余潇枫:《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广义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第8—13页。

⑤ 余潇枫、章雅荻:《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49—76页。

⑥ 孙越、董军:《浅析“生物公民权”的建构机制》,《自然辩证法通讯》2015年第3期。

力全面提升的同时，也在国际上促成了跨国贸易、生产、金融体系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它是以往人类本地化、分散化漫长存在方式的终结，是异地化、集成化存在方式的开启。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给人类带来“共享”文明进步的便利，也给人类带来“共担”危机灾难的可能。

新冠疫情危机暴发让人类的全球化来了个“紧急刹车”，随之“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sup>①</sup>现象迅速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领域。有人认为，这是“全球化的逆转”“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的挫折”；另有人则认为，这恰恰是“深度全球化”“再全球化”的开始，是一种“选择性全球化”的到来，是“替代型全球化”向“互补型全球化”的回归；或认为这是“中国式全球化”的大好机会，等等。“逆全球化”随着新冠疫情危机而加深，接踵而来的是“全球去中国化”加速，这是中国学者特别需要关注和研究的课题。国防大学唐永胜教授认为，再全球化才是人类未来的出路所在，“在根本上，全球化中的问题要进一步全球化才能得到解决”“中国传统中的和合文化和天下情怀，在世界变局中就具备了新的条件得以发扬光大”。<sup>②</sup>

在对逆全球化与再全球化展开对峙性研究之时，有学者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即达成人类与非人类共生共享目标的“后人类”视角。本文提出“网”球化概念正是基于“生态世”的理念，运用“后人类”视角的一种理论探索，并以此来展示人类发展新趋势及人与自然和谐的新图景。“网”球化的“网”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广义数据网”，二是“广义生态网”。前者是“数字化”“符号化”为本质特征的“信息人”世界的形成，后者是基于“生态化”“智能化”为生存特征的“智能体”或“超人类”社会的形成。这两个“网”的形成与交织都是对“主权国家体系”藩篱的超越。

“广义数据网”的超越性体现在其“超时空”特征上。构成宇宙的三大基质是物质、能量和信息，而物质与能量都是信息的载体，信息是物质与能量意义表达。以信息为生存本质特征的未来“网生代”——“信息人”与人类以往非“网生代”的“实体人”的最大区别是：“信息人”跨越了一切国界，进入了“无边界”或边界不断延伸的数字空间。我们知道，人是一个由脑神经功能主导处理信息的“巨型复杂的系统”，人通过自身系统与外界环境系统进行着物质、能量及信息的交换，信息的接收、处理、输出是其生命持存的重要标志。在网络中，

① 李丹：《“去全球化”：表现、原因与中国应对之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第99—108页。

② 唐永胜：《解析世界变局》，《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2期，第5、6页。

生命似乎是由许多视窗组成的,真实的生活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视窗而已。如果说,物理空间是基于地缘的、物质的实实在在的现代社会,那么,网络空间则是基于认同的、观念的虚拟时空或另类生存空间。现代人类正构筑一个网上信息世界,它是现实的物理世界在网上的投影,而这个网上信息世界将逐渐成为物理世界的统治者。在网络空间里,所有信息都以数字形式存在,从而实现了人类交往的非主权性质的全球化和全面化。信息人的参与是虚拟实在得以建构的前提,而虚拟实在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文化,是人类在可能世界里的驰骋的一种投射。信息人、网络社会、虚拟实在构成了“网”球化的现实基础。这三位一体的相互交错,不仅展示了一种新技术革命的颠覆性,一种新生存方式的建构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个人的生活方式将被改写,人类的生存状态也将重新编码。已有专家断言:“现在,唯一可供我们的文明继续扩张的领土——唯一真正的边疆——就是电脑化空间。它是人类赖以相互交往、发展经济、进行社会和政治谋划的新场所。”<sup>①</sup>

“广义生态网”的超越性体现其“超人类”特征上。一方面,“超人类”强调的是人类与非人类的和合共生,除了人类与有生命的物质如微生物世界的和合共生,还有人类与非生命智能体的和合共生,如各类由人类制造的“智能体”(如智能机器人、虚拟信息人等)超越了一切人种,带着自定义、自修复、自学习的程序进入了“无限定”的类生物世界,它们不以谷物与果蔬而以信息数据与能量为“生存之必需”;另一方面,“超人类”强调来自于人类对自身的生物性突破与“超越”,当基因密码被重新读写,当机械心脏、智能肢体、替代性器官不断成为未来人类身体一部分的时候,人将越来越远离病症与不断地延长寿命,一个尚不能预料的“超人类”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

“广义生态网”与“广义数据网”相互交织,构成人类未来的“广义安全论”基础,<sup>②</sup>并可以用具有相互可通约的算法来表达。面对新冠疫情危机,中国运用“健康码”数据流系统,通过自动生成和免测体温,一下把人口众多、面大量广的应对危机联合行动按照健康码“三色”(绿码、红码、黄码)算法组织得有条不紊,极大提升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效率,令世界惊叹,其体现的正是“广义生态网”意识与“广义数据网”的威力。当今的数据主义者甚至认为,“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或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同样的数

① 胡泳:《另类空间》,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页。

② 余潇枫:《和合主义:“广义安全论”的建构与可能》,载余潇枫等:《非传统安全理论前沿》,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3—14页。

学定律同时适用于生化算法及电子算法,于是让两者合一,打破了动物和机器之间的隔阂,并期待电子算法终有一天能够解开甚至超越生化算法”。<sup>①</sup>因而,未来世纪将是生物算法与人的算法汇聚的“算法世纪”,“算法已经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概念。如果了解我们的未来及我们的生活,就必须尽一切努力了解什么是算法。”<sup>②</sup>

#### 四、从“P-托邦”转向“E-托邦”

“信息数据网”与“广义生态网”相交织的“网”球化才是人类应对非传统“占争”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也是体现“后人类主义”视角的重要维度。不仅“人工智能有可能改变战争的形式和原则,并对现行的国际法律和伦理道德造成冲击”<sup>③</sup>以及“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有望帮助重塑全球秩序”,<sup>④</sup>而且“生态世”中“网”球化是要实现人类与非人类和合共生与和谐共享。

人类与非人类和合共生不仅是人类与微生物世界的“和谐”设计,而且也是人类超越主权体系的理想设定。“P托邦”(P-topia, People-topia 的缩写)是超越主权体系重要构想。罗尔斯认为,全球正义须建立在没有主权国家的前提下,他把没有国家、只有人民的“P托邦”视作人类的最高理想。罗尔斯在其《万民法》中以超越一切民族与国家的“人民”为其承载正义的世界性实体,开卷便以“人民社会”来称谓其代表普遍正义与终极理想的社会形态,展示出一幅人类正义未来的美好图景。<sup>⑤</sup>

然而,要实现人类与非人类的和谐,没有主权只有人民还不够,还需要根据“生态世”与“网”球化理念建构起三个E合一的“伊托邦”(E-topia)<sup>⑥</sup>或称“3E-托邦”。它有三重含义:一是生态网络(Ecology Networks)化生存;二是电

① [以色列]尤瓦尔·赫托利:《未来简史》,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335页。

② 同上,第75页。

③ 傅莹:《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析》,《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1期,第1页。

④ Shazeda Ahmed and Nicholas D. Wrigh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na, Russia, and the Global Order: Technological, Political, Global, and Creative Perspectives*,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bama: Air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⑤ [美]约翰·罗尔斯:《万民法》,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⑥ William J. Mitchell, *E-Topia: Urban Life, Jim-But Not as We Know I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9。另外,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描绘过以生态学为依据的“E托邦”图景,“年轻人自发的公益团体、非赢利自由媒体、无政府主义研究会、黑客和网络社团、遍布全球的地下音乐传播体系、艺术家社区、互助公社、各种亚文化圈”为社会活动的基本形态。

子网络(Electronic Networks)化生存;<sup>①</sup>三是美学网络(Esthetics Networks)化生存。<sup>②</sup>“3E-托邦”理想是与“生态世”与“网”球化理念相应的新型社会“构型”。以作为支撑“3E托邦”的人工智能来说,中国提出了相应的六大原则:福祉原则、安全原则、共享原则、和平原则、法治原则、合作原则,揭示出实现未来超越人类一切冲突之美好图景的价值前提。<sup>③</sup>因而“3E托邦”比较好地表达了“网”球化给人类带来的新图景,并且与“生态世”的相呼应,即是人类在“生态世”中基于“广义生态网”与“广义数据网”新生存方式,实现纯然“美学”化的生存境界。

面对非传统“占争”,其实,以人类命运为最高目标的安全算法需要被迭代。人类与非人类的异质性冲突,必须要有新的算法来应对,人类的最佳选择是与非人类的和合共生。对微生物世界来说,人类要努力让微生物成为不可或缺的“朋友”,如在工业上根据微生物特性可用于发酵、单细胞蛋白获取,在农业上不断发展出的生物农药与生物肥料,在维持生态平衡中微生物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保护环境用于废污水处理的生物学方法不但经济而且有效等。对于非生命的智能体世界来说,人类可以运用“阿西莫夫三定律”<sup>④</sup>或者“人类兼容三原则”<sup>⑤</sup>来实现人类与它们和合相处。可见,以“后人类主义”视角把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生态圈视为一个大型网络或多重关系聚合体,特别当安全治理面临各类“异质性的冲突”时,人类的最佳选择是与“非生命智能体”“有生命物质体”“与意识和情感关联的非人类行为体”的共生共享。

“非传统占争”“生态世”“网球化”“3E-托邦”等正是非传统安全理念的3.0版。按照这些理念重新理解安全时空,安全图景将变得宏大而清晰:安全是“历史、现实、未来”时空叠加而形成的关系结构与宏观趋势,是“场景—情景—前景”价值交错而构成的关系聚合与人文选择,也就是说本体论意义上的安

---

① 指的“e时代乌托邦”(eutopia,或 e-utopia),指称与 electronic、email、Internet 息息相关的“网生代”新的生存方式,是实实在在地脱去伪装的“虚拟世界现实化”,而非现实世界的“乌托邦”化。

② “网”球化时代的美学化生存包括了“网络美学”成为“网生代”的普遍审美方式。参见曹增节:《网络美学》,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傅莹:《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析》,第17页。

④ 1942年,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其科幻小说《环舞》(Round Around)中提出了机器人行为三定律:第一定律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或者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机而袖手不管;第二定律是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给予它的命令,当该命令与第一定律冲突时例外;第三定律是机器人在不违反第一、第二定律的情况下要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生存。

⑤ 第一原则是机器的唯一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偏好;第二原则是机器最初不确定这些是什么;第三原则是关于人类偏好的信息的最终来源是人类的行为,参见 Stuart Russell, *Human Compatible: AI and the Problem of Control*, London: Allen Lena Press, 2019。

全,不是一种单一的、线性的、局部的、纯技术的安全,而是复合的、非线性的、整体的、技术与价值聚合的安全。因而,当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基于生命的新物质体”“基于物质的新生命体”“基于智能的非生命体”以及“基于与意识和感情关联的非人类行为体”均介入安全治理中时,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更多地是通过“聚合”(Assemblages)<sup>①</sup>来实现和合共生的。“聚合”与“集合”有着本质区别,“集合”是指沿着“结域”(Territoriality,或译领域性)和“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或译去领域化)轴线划分的各种实践和社会实体的偶然无序性或临时性“汇合”,聚合则是超越这类界限的价值关联与共创。“广义生态网”和“广义数据网”在本质上即是一个具有拓扑性质的、呈现多重关系的庞大聚合体。

总之,微生物对人类持续存在着的种种非传统“占争”,使我们看超越人类传统理念的新安全场域,这不仅需要我们对孙子“止戈为武”的理念作另一种理解:“止戈”并非只是不动武或用武的实力威慑与遏制武力,而且需要开创未来人类面对非传统“占争”安全场域的升级版理念与安全算法。自然与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源,自然的合理性永远不会因为人类的“立法”而改变,人类只有通过提升理念以改变自己,才能实现向看似无形的原初存在的自然合理性回归,这也是“后人类”国际关系所正在努力求得的新目标。当然,对非传统安全理念3.0版进行畅想有较多的理想主义色彩,然而,我们身处的是一个“通过改变理念而改变现实”(Changing Reality by Changing Ideals)<sup>②</sup>的“反身性”<sup>③</sup>时代,正如人们追求“永久和平”一样,这种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畅想正是导引人们努力奋斗的“方向标”。

---

① Manuel DeLanda, *A New Philosophy of Society: Assemblage Theory and Social Complexity*,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6, p. 10.

② Philip Allott, *Eutopia: New Philosophy and New Law for a Troubled World*,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16, p. 3.

③ “在反身性系统中,人们根据对最近或当前发生趋势的感觉生成了对未来发展的期望,从而触发导致预期发生的行为反应。”引自〔美〕奥兰·扬:《复合系统:人类世的全球治理》,第95页。